

情感劳动与流动的共同体

——论王安忆新世纪以来小说中的移民与家庭

陈湘静

内容提要 王安忆新世纪以来的小说以“移民”和“家庭”为主要题材，主人公大多有着漂泊、离散的际遇，家庭和血缘的关系越来越淡漠，而与陌生人的情感联系则越来越强。可以说，她敏锐地捕捉和把握到了全球化时代下的政治经济现实，即高流动性经济所造成的人口的离散、漂移，以及由此导致的家庭的结构分裂。但她试图在不稳定的生活世界里重建日常生活，这体现在她两类题材的小说中：“保姆的故事”和“江湖的故事”。在这些小说中，王安忆试图给出自己的回应和解决方案——以日常操劳和情感劳动为中介，使陌生人“家人化”，从而与邂逅的陌生人结成“流动的共同体”，重建一个“乡土人情社会”，以此作为家的替代。

关键词 移民；家庭；共同体；情感劳动

引言

王安忆擅长描写市井人物的日常生活，不过，王晓明指出，从2000年的《富萍》开始，王安忆开始有意识地批判“现代化”意识形态，她的视角开始从淮海路、南京路等中心地带转向苏州河、闸北、棚户区等“边缘地带”，并聚焦于保姆、房管处木匠、船工、拾荒者等“边缘人物”^[1]。不难发现，这些“边缘人物”的另一种身份便是进城的农村移民。这些移民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的漂泊不定，恰恰是与王安忆所赞赏的日常生活的“恒常性”相冲突的。对于王安忆小说中的“移民”问题，少有评论者进行探讨。事实上从《富萍》开始，一种关于全球化时代里人的漂移、离散的主题就开始持续贯穿在王安忆的小说中，比如《遍地枭雄》《上种红菱下种藕》《众声喧哗》《匿名》《红豆生南国》等作品。在这些故事中，个体往往从原来的生活世界“脱落”和“逃逸”出来，流落到大千世界中，游历和邂逅形形色色的陌生人。在《富萍》中，无父无母的富萍从乡下来到上海，跟随着陌生人“奶

奶”做保姆，游历和见识上海的各色人群。《遍地枭雄》中，从未离家的城郊青年韩燕来独自一人在上海开出租车，被劫持后与劫匪共同经历了一段漂泊的生活。在《上种红菱下种藕》中，秧宝宝由于父母在外地打工而离开沈淙老家，寄宿在华舍镇。在《匿名》中，更是充满了各种背井离乡、流落大千世界的形形色色的游民个体。可以说，移民成为了王安忆新世纪以来小说的主要书写对象。

这样一种作家的文学世界的变化或许和新世纪以来现实世界的变化有一种呼应关系。本来，乡土社会瓦解，个体脱离乡土，进城漂泊，是现代工业社会的普遍特征，但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产业结构和产业分布的大幅度调整，中国越来越显示出一种后工业主义的显著特征，人口的大规模、跨区域流动成为了常态。据统计，至2016年止，中国的人户分离人口已达2.92亿人，占全国总人口21.1%，流动人口已达2.45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7.7%^[2]。其中，农民工占据显著比重。从1996年至2006年，外出农民工数量从34000000人（0.34亿人）增加至132120000人（1.3亿人）^[3]。这些没有固定住所，没有固定单位的流动人口，构

成了中国社会的一个可观现象。“移民”成为了劳动者的主体，而王安忆无疑是在美学上处理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

我们知道，家庭和日常生活的“恒常性”是王安忆美学的重要构成部分，她对日常生活和情感的理解，都与一种乡土或市井的美学联系起来，一种类似农人劳作的“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式的扎实勤勉的态度。然而，移民社会的高流动性却与这种恒常稳定的日常生活形成了冲突。当经济全球化使人们离开故土、流散迁徙，当聚散无常成为人际关系的常态，王安忆要如何在一个移民的现实世界中落实她的美学理想？本文打算从王安忆新世纪以来的小说创作入手，探讨王安忆在后现代状况下对移民和家庭的思考。在她的新世纪以来的小说中，家庭和血缘的关系越来越淡漠，而与陌生人的情感联系则越来越强。比如，《乡关处处》中，月娥与丈夫孩子长年分离，在上海当保姆，却与同住一个屋檐下的上海老人、一只弄堂里拾回来的流浪猫形成了相濡以沫的家人般的关系。《向西，向西，向南》中的陈玉洁，家庭名存实亡，独自在纽约度日，却与偶然邂逅的中餐馆老板娘美棠相依为命。《众声喧哗》中，失去老伴、无人说话的欧伯伯，却与对面小区的年轻保安说起了知心话。可以说，王安忆以其对现实的敏感细腻的体察，捕捉和把握到了后工业时代下人口离散、家庭难圆的政治经济现实，但她并非对这一政治经济学现实进行简单复刻，而是试图以一种独特的逻辑重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无根无系的移民中间缔造一个“流动的共同体”。

一 全球化时代下家庭的“不可能性”

以“衣食生计”为重要考量，并严格遵循“现实”的逻辑来构建小说情节的王安忆，对于移民家庭难以保持完整的经济生活的现实是有着充分意识的^[4]。移民的艰难生活在她的许多小说中都有体现。在《富萍》中，在上海人家帮工做保姆的女人大多是孤身一人。“奶奶”虽然骄傲精明，为自己攒了不少家私，却无法找到真正的感情归宿，只能靠过继和供养远房亲戚的方式，换取养老的保障。

吕凤仙虽然有回乡嫁人的机会，却疑心对方要霸占她的锡箔店而最终没有嫁人。而住在富萍隔壁的宁波太太，为了家用而狠下心遣独子到上海学生意，长期母子分离并最终痛失爱子，积攒下的家财背后也有着辛酸的创痛。在《骄傲的皮匠》中，小皮匠与乡下的妻子儿女长期分离，在上海过着清苦寒素的生活，最终无法抵挡对温暖贴心的日常生活的需求，与弄堂的根娣产生了感情。《乡关处处》中，月娥与家人在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分散在天南海北，仅在过年时得以短暂团聚。在谋生不易的大城市，金钱和真情似乎始终处于一种对立的关系中，凡是得以立足的移民，似乎都“命硬心硬”，难以保持完整的家庭。对于这些移民来说，情感与物质是分离的，他们“有情无家”，没有足够的经济能力在大城市中扎下根来，只能把家安在乡下，与家人长期分离。

在另一些故事中，移民则是“有家无情”，家庭在经济结构上是完整的，情感却是缺席的。《香港的情与爱》中出身唐人街的老魏，《新加坡人》中的新加坡人，对妻子都没什么感情，家庭更像是纯粹为了谋生而结合的经济单位，“爱情对于他们是奢侈，生存是最要紧的”^[5]。正因为家庭的再生产包含着沉重的物质负担，王安忆以“恩”来形容爱情这种沉重性质^[6]。在《红豆生南国》中，家庭成为了令主人公畏惧的沉重窠臼和桎梏：“他很怕近呢！近呢意味受恩，他是个负债累累的人，尽其一身图报都不够用。”^[7]出生于福建农村并移民香港的主人公，一路从底层攀升至中产，与家人的情感却在买房还贷、攒养老金等经济事务中磨损殆尽。

移民家庭的难以完整有着深层次的政治经济学原因。克劳德·梅拉苏克斯（Claude Meillassoux）指出，在城市打工的农村移民往往不能像城市居民那样享受完整的福利制度，只能领取计日工资或计件工资，生病、养老、养育后代等费用则由农村的小农家庭经济承担^[8]。在这种“农村家内经济”与“城市资本主义经济”并存的结构下，移民无法在城市永久安置并进行家庭的再生产，只能往返于城市的市场经济和小农家庭经济之间。中国当下的城乡二元结构正是这样的机制，由于人多地少，中

国不得不以土地作为替代性的社会保障^[9]。贺雪峰指出，现阶段中国农村家庭普遍采用青壮年进城务工、妇女老幼在村里务农的代际分工，只有务工收入和务农收入加起来才可以维持一个几口之家在农村正常的再生产并积攒下一定的现金，用以支付嫁娶、盖房、丧葬等大宗费用^[10]，“离开务工收入和务农收入中的任何一项，农民都会比较困窘”^[11]。换言之，作为一个经济生产单位的小农家庭，是结构性地分裂于城乡之间的。农村移民家庭在政治经济现实上的破碎在许多描写底层移民的文学作品中都有所体现。方方的《涂自强的个人悲伤》中，学历平平的涂自强在把母亲接到城里后，因难以维持生计而疲于奔命、并在缺乏社会保障的情况下积劳成疾而死，道出了移民家庭在城里难以进行再生产的现实。陈应松的《野猫湖》中，因丈夫长年在外打工，在情感和身体上长期荒疏的香儿与长期照顾她的庄姐产生了同性之爱，并最终杀了对她来说已经成为陌生人的丈夫，揭示出了移民身体无法“在场”而使家庭难以完整的残酷现实。在徐则臣的《跑步穿过中关村》中，我们看到了“非正式经济”和“非正式关系”的两相对照，办假证、卖盗版光盘，做皮肉生意的游民的情感只能落实在同居、嫖娼这些婚姻之外的形式上。贾平凹的《高兴》中，拾破烂的刘高兴虽对发廊妹孟夷纯有真情，却无力阻止她以卖淫的方式挣钱。这些底层小说都是残酷的，甚至是血淋淋的。

然而，王安忆的小说并非对这一政治经济现实的简单复刻。《乡关处处》中，农村保姆月娥的家庭在政治经济学意义上是不完整的，但小说却通过对月娥春节回家后的劳作的描写，传达出其家庭生活的“稳固感”与“恒常感”。有意思的是，王安忆选取了“春节”这一时刻作为描写其家庭生活的切入点。我们知道，一年是农村移民在外漂泊的周期，春节是农村移民得以返乡和家人团聚的时间，也是他们的“家”得以实现完整的唯一时刻。而小说也以一年为周期来结构自身，始于年初月娥进城，终于年末月娥回家，首尾构成一个完整封闭的循环。但这种团圆仅仅是仪式上的，一顿年夜饭，短暂的几天相聚，并不能完成赡养老人、抚育儿女的实质功能。然而王安忆却对月娥在家中劳作的场

面给予了详尽的描写，赋予这个仅余形式的“家”以完整感和实在感：

封上坛口，烧一圈蜡，密闭了缝隙。站起身，剥下来的皮扫进簸箕，锅里的饭焦铲下，盛进竹篮，鸡汤熄火。冰箱插上电，打开便亮起灯，向里看看，炒的酱，杀好的鱼，蒸的馒头，从上海带来的一只蛋糕，分生熟冷冻，全归位了，这才关灯上楼。^[12]

这样细致而极具物质感的细节描写，明显地有别于对月娥在城里的生活的描写。月娥在城里的时间是被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所组织的时间，“每日天不亮出门，一个上午转两份人家”，午饭或是在厨房里“找些冷剩热热”，或是“急着吃完撤离饭桌”^[13]。对于这样的生活，王安忆仅以流水账式的叙述作交代，但在描写她在农村家里的劳作时，却细致到了每一个动作，仿佛这一年的匆忙遑遽的生活在这一刻慢了下来，仿佛在城里只是“活着”，在农村却是“生活”。张旭东和王斑都曾指出，王安忆对日常生活细节的铺陈是一种本雅明式的、对于人的丰富完整的感性经验的拯救，蕴含着对空洞、扁平的意识形态的抵抗^[14]。王小明认为2000年之后王安忆对日常生活的写作，是对强势而空洞的“现代化”意识形态的抵抗：“这是一种重压下的反拨，一种堪称是自觉的对抗，它既是针对身外的恶劣和麻木，也是针对心内的沮丧和悲哀。”^[15]换言之，月娥在春节这一时刻的劳作是脱离了金钱关系支配的、身心合一的劳动，联系着一个整全的、本真的生活世界。月娥家的“完整”不在于她与五叔的法定婚姻关系或共同的财产，而在于他们共同的劳作——洗衣、生火、铺被窝、剥苋菜。如果说移民的家庭在政治经济学的意义上是不可能完整的，那么王安忆将家庭进行了重新定义，要以一种日常生活的劳作，重建家的“完整性”。

在王安忆看来，家庭绝不只是一个单纯的经济共同体，家庭的本质是以日常劳作作为中介来铭刻个人情感。理想的家庭与一种前现代农业时代的生活方式类似，需要时间、精力、情感的细水长流的灌注。她说：“感情也是有原则的，它和劳动的原则不谋而合。付出的汗水越多，来年的收成越好。”^[16]在《香港的情与爱》中，王安忆曾将恋爱比喻为农

人似的劳作，“就像在地里种庄稼，要犁耕，播种，锄草，施肥，一日一照应，一夜一关护，眼看着它今日发芽，明日长叶，后天再开花。”^[17]然而，现代工业社会追求效率、工具至上的导向却侵蚀了感情得以培育的基础：“这是个极有效率的世纪。当地里的庄稼都在催长素的刺激下飞快地成熟，将自然的规律抛在一边，思想这样人性的产物，便也逃不脱催熟的命运了。思想就像暖房里的蔬菜，缩短了季节。”^[18]思想如此，情感同样如此。在这个意义上，家庭的危机来自于一种整全的生活意义的丧失，来自于感性经验被资本主义时间挤压和剥夺之后异化而空洞的生活状态。

当外部的经济压力使得家庭在结构上分裂（如月娥这样的农村打工者），或使得家人关系沦为纯粹的商品关系（如陈玉洁的家庭）时，家庭就不再可能。近些年来在中国和日本等国家面临的少子化、结婚率下降、人口出生率下降等问题，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不安定的经济状况下家庭越来越难以实现的现实。于是，在王安忆新世纪以来的小说中，我们看到了一种颇有意味的转换，即日常生活不再存在于家人之间，而是发生于陌生人之间。比如美棠为陈玉洁亲手做的蛋炒饭，比如根娣为小皮匠做的粉丝蛋饺、鱼肚虾仁。在这些小说中，以日常生活为中介，王安忆开启了与陌生人建立情感联系、成为“家人”的可能性。

二 情感劳动与陌生人的“家人化”

如果将《向西，向西，向南》与《上种红菱下种藕》作对照，我们会发现王安忆提供了一种对缺失的亲情的弥补或替代方式。在前者中，血缘至亲因为缺失了日常劳作而使关系变得疏远，而在后者中，陌生人却能够通过日常劳作发展出家人一般的感情。秧宝宝对陆国慎产生依恋之情，正是因为她做了妈妈通常会做的工作：

虽然是不说话，可秧宝宝却时时感觉到陆国慎在场。洗干净、叠好了、端端正正放在她枕头的衣服上，有陆国慎手上的防护霜的气味；饭桌上的几种菜，是陆国慎特有的风格，比如，豇豆也好，茭白也好，茄子也好，南瓜

也好，南瓜也好，一律上锅蒸熟，再浇上酱麻油或者腐乳汁；晚饭以后，新闻联播时候，家里人都在，七嘴八舌地说话，其中又多了陆国慎女中音的声音，李老师和闪闪都是有些火爆的，而陆国慎的声音进来，就起了中和的作用，变得均衡了……陆国慎虽然不像闪闪那么活泼有趣，但她却有着一股渗透性的影响力，在她周围，布满着她的空气。^[19]

在这里，陆国慎做菜、叠衣服、点蚊香的方式是独特而具有个人化特征的。王安忆对“个人痕迹”和“个人气质”的重视，与本雅明十分相似。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本雅明指出，一件艺术品之所以不可复制，是因为它诞生于特定的情境中，身上铭刻了当时当地的痕迹，并包含了自身被生产出来的历史^[20]。而现代资本主义的机械复制产品和标准化的技术手段使得个人特征、个人痕迹趋于消失，随着每一小块土地都被注册登记，住房被编号，“人们在大城市的人群中不留痕迹地消失了”^[21]。而在王安忆看来，这种独特的感情和个人气质是包含在个人劳动中、通过劳动而体现出来的。在《小说的情感》中，王安忆曾讲到，一个感情经历坎坷的女人，靠制作梨木梳子度过漫长的岁月，当工厂采取她的技术对梨木梳子进行批量生产时，海外客商却因为梳子毫无特色而退货了。王安忆说：“老太太亲手做出的梳子和小工厂成批生产的梳子有怎样的区别呢？老人的梳子里有着她个人的痕迹，这痕迹包含着她情感的过程，这个过程是谁的就是谁的，别人代替不了。这就是个人气质。”^[22]同样，现场听音乐会和数码唱片之所以不同，是因为前者包含了“活生生的状态，注入了每时每刻的心情”，而后者则“完全抹去了它演奏状态的生动性，我们再也看不见劳动者的痕迹，看不见创作者的激情”^[23]。可见，“在场”和“过程”在本雅明和王安忆那里具有重要的意义，过程的不可取代性决定了情感的不可取代性。“家人的陌生化”（陈玉洁的家庭以机械复制劳动取代了家庭劳动）、“陌生人的家人化”（秧宝宝与李老师的雇佣劳动中融入了个人化的情感）正是发生于此。

王安忆发现的这种悖论性的状态，恰恰发生于

“情感劳动”（affective labor）的领域。情感劳动是一种以生产或调控人的情绪为目的的劳动，通过与他人交流和互动而使他人产生出一定的情绪，比如轻松，舒适，满意，兴奋，或激情等^[24]。保姆的护理工作就是一种典型的情感劳动^[25]。有意思的是，秧宝宝与李老师（或陆国慎）实际上是一种类似保姆的雇佣关系，但它却沿着家人的逻辑而展开，从而体现出日常劳作对于商品关系的强有力改写。保姆付出的劳动是一种可供购买的商品。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女性在家庭内部的生育和家务劳动的经济价值都得不到承认和偿付，成为了一种隐形的无偿劳动^[26]。从20世纪70年代起，在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的推动下，家务劳动的经济价值开始受到重视，家务劳动开始薪酬化。而保姆这一职业在将妇女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的同时，也将低成本的家务劳动转嫁到了来自较低阶层的妇女身上。但保姆的劳动又与一般的商品不同，它处理的是人的身体和情感，在本质上是一种对人的主体性和社会关系的生产，也即迈克尔·哈特、安东尼奥·奈格里所说的“非物质生产”^[27]。保姆提供的劳动中包含着大量的情感投入，比如在照看小孩的过程中需要投入关注和爱，对雇主的情绪予以及时的照拂、关注和回应。亚莉·鲁塞尔·霍斯柴尔德（Arlie Russell Hochschild）在其研究情感劳动的开创性著作《被管理的心》中指出，保姆、护工、秘书、空姐、服务员、导游、推销员等服务性行业需要根据不同的客户人群和职业要求，制造或呈现出与特定场合相匹配的情感和情绪^[28]。而其中的问题在于，在付出情感劳动时，必须展现出足够的真诚度，在职业性的情感输出中，还有“深层表演”和“浅层表演”的区分，心不在焉或者机械僵硬，都会被视为是不“专业”、不“合格”的服务。因此，这实际上是将人的内在情绪、情感商品化了^[29]。而这种极端异化又被一种政治经济学的不平等所加强，即保姆业被视为一种处于产业链末端的低端劳动，并经常由来自收入和阶层较低的妇女承担，从而催生了菲佣这样的“全球护工产业链”^[30]。在中国，则是由月娥、富萍这样的农村妇女承担。现实中，像范雨素这样的育儿嫂，为了挣家用，不得不把自己的未成年女儿留在城郊农村，而去照顾别

人家的孩子^[31]。2017年杭州蓝色钱江小区发生的保姆纵火案，以及红黄蓝幼儿园的虐童案，都是金钱关系使情感劳动异化加上政治经济学不平等而导致伦理危机的极端例子。

然而在王安忆这里，情感劳动的悖论却向另一个方向转化，情感劳动恢复了其不可化约的独特性，反过来改写了商品的逻辑。在《富萍》《乡关处处》中，保姆往往与雇主有着亲熟的关系，是一个家庭成员般的角色。《富萍》中的“奶奶”掌管东家的开销，指导东家的吃穿起居，很有主见地参与客人的谈话，“看上去，她不像这家的保姆，而像是这家人一个终身未嫁，抑或守寡的姑妈和老嫂子”^[32]。月娥在驻沪的台湾人家里做工时，即使语言不通，生活习惯迥异，却在做饭、熨衬衫的过程中自然熟稔而不感觉隔阂，这家人也“不把她当下人待。倒不是多么热切，恰恰相反，是平淡的，仿佛在他家已经很久，一个亲戚”^[33]。可以说，在这些保姆身上，体现了通过情感劳动、日常生活将商品雇佣关系转化为家人和亲情关系的契机。

这种“陌生人的家人化”，体现了生命政治的溢出。从生命政治的角度来看，人的主体性与个人的身体密切相关，受冲动、本能、欲望、情感的左右。保姆的贴身操劳是身体性的，它在日常的、微观的层面上参与着对个体“内在”的欲望、情感、情绪的生产，因而具有改变人的主体性的能量，甚至会越出原有的规定性的秩序（雇佣关系或殖民关系）。人类学家安·劳拉·斯托勒（Ann Laura Stoler）在对19世纪荷属印尼的研究中发现，荷兰殖民者在到达东南亚之初，为生活之便，常常将当地土著纳为情妇或家仆，这本是一种等级性的殖民等级关系，但是同在一个屋檐下的长期生活往往滋生出模糊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界限、扰乱等级秩序的危险——印尼女性往往掌管了一家之内重要的经济事务，荷兰人与印尼人发展出亲密关系并生下无法被当局归类的混血孩子，印尼保姆带出来的孩子在穿着打扮、谈吐举止上往往跟随着照顾他们的印尼人而不具备欧洲中产白人家庭的“体面气质”等^[34]。这正是“非物质劳动”在重塑人的主体性、改造社会关系上的强大作用。这让我们想到了王安忆的另一部小说《新加坡人》。新加坡人的前妻本是一个被雇来“替

他洗衣，煮饭，收拾屋子”的华人女工，长得并不漂亮，书也读的少，本来两人并无可能婚配，但在照顾饮食起居的共同生活中，产生好感，阴差阳错生了孩子，正体现了日常生活改造人的主体性上的巨大力量^[35]。王安忆曾说，就算是本无感情的两个人，在处理各种琐屑杂事的共同生活的过程中，也有可能缔造出成功的婚姻^[36]。她的许多小说都体现出这种“共同生活”的力量。《骄傲的皮匠》中，小皮匠远离妻小，过着清苦寒素的生活，却在寄存衣服、热饭热菜的日常往来中，与弄堂的根娣产生了感情。在王安忆看来，“家人”的感情正是发生于这种日常操劳和肌肤接触中，在日积月累中，量变可以引起质变，由陌生人成为亲人。

在现代社会中，人们往往是出于经济和职业的原因而与陌生人打交道，对功利性和有用性的追求往往加剧了本真性意义的虚无与瓦解，但王安忆的小说让我们看到了将商品关系转化为亲情的可能。哪怕与陌生人的关系一开始只是一种雇佣关系（月娥和爷爷一家、秧宝宝与李老师、新加坡人与华人女工），亲身参与、共同度过的日常生活却能够改变关系的性质，使非亲非故的陌生人成为亲人。其中，“在场”显示出它的巨大力量，它是使得人与人的感情保持鲜活的重要条件。当家人的身体性的“缺席”使家不再成为家，“在场”的陌生人却可以以“情感劳动”和“日常操劳”为中介成为我们家人一般的存在。由此，孤独脆弱的个体可以在与陌生人的萍水相逢的偶遇中，与非亲非故的陌生人结成“流动的共同体”。

三 流动的共同体与“乡土人情社会”的重建

在现代社会，人与人的关系被工业经济关系所组织，而这种围绕着交换价值而建立起来的人际关系是空洞的，个人成为了商品生产链上可被替代或可被丢弃的一环。而后工业时代的高流动性的经济，则使人与人之间的联系进一步碎片化。这种“名”（与财产秩序关联的个人身份）与“实”（真实的个体情感）的分离，在《匿名》中达到了极致。在里面，写字楼里的租户来了去，去了来，

“每时每刻，有多少公司在注销，好比每时每刻发生的失踪人口”^[37]。“萧小姐的电话是空号，户口是空挂”，究竟世上有没有这个人都不知道^[38]。杨莹瑛试图寻找丈夫下落而拨打名片上的电话，追踪到的却只是一些疏离的经济关系，这些线索将她带往“物”在世界各地的流向——“四明山的毛竹”“津巴布韦”、讨债公司——却始终无法带往失踪的人本身。在《新加坡人》里，新加坡人与雅雯有过短暂的邂逅后离开，三个月后再回到上海时，由于员工的频繁流动，在她原来工作的酒店却找不到她了，“这么大个上海，找一个人就像找一枚针。雅雯从此，便从视线中消失”^[39]。在《乡关处处》中，月娥的雇佣关系经常在戛然而间结束，或是因为台资公司突然撤资，或是因为雇主老病卖房，她不断地与不同的人邂逅和别离，“上海的人就是海里针，手一松就没有了”^[40]。

如果说“无常”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特点，那么人与人之间的羁绊就是乡土社会特有的。如费孝通所说，乡土社会是知根知底的熟人社会，人们遵循着熟习的规则打交道，不像“现代社会是个陌生人组成的社会，各人不知道各人的底细，所以得讲个明白”^[41]。乡土社会中不存在一个统摄一切的抽象原则，“亲密的共同生活中各人互相依赖的地方是多方面和长期的，因之在授受之间无法一笔一笔地清算往回。亲密社群的团结性就依赖于各分子间都相互的拖欠着未了的人情”^[42]。对王安忆来说，“乡土”代表了一种关于人际关系的理想，它代表了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具体生动的关系，一种稳定的情感羁绊。而这种情感羁绊就成为了在流动不居的状态中形成共同体的准备，在《生活的形式》里，她说：

我所插队的安徽农村，县里召开基层干部会，是不负责伙食的，那就需要队里自己解决吃饭的问题……在那里，假如有人病重，要送城里医院治疗，病人要去，病人的丈夫或者妻子自然也要去。父母一走，孩子怎么办？带去。那么猪谁来喂？鸡谁来喂？于是跟去。狗会自己找食，本是不必去的，可因为眷恋家人，便也去了。就这样，医院的院子里都是一家子，一家子，鸡飞狗跳，烟熏火燎，像个野

营宿地。可是，有趣味的形式，就是发生于此。^[43]

她在《文工团》里描写的正是这样一种乡土式的羁绊关系，对于这个处于社会主义时代尾巴尖上的日暮穷途的集体，王安忆给予了温馨的描绘。在这里，旧戏班子的老艺人，艺术院校毕业的大学生，不得志的政治干部，下放的知识分子，意欲落户的农村青年共同生活在一个院落里，在前途未卜的动荡时代中，相濡以沫，相依为命，“院子里有老有小，有鸡有狗。上班下班，吃喝拉撒，统统锅端”^[44]。“那破败的小院，像老母鸡样，张开了羽毛凋零的翅膀，为他们挡着风雨。”^[45]这种羁绊，王安忆形容为“连成一片，唇齿相依”，是“打断骨头连着筋”^[46]。

我们可以发现，《上种红菱下种藕》的沈淙、华舍镇，《遍地枭雄》里韩燕来的城郊村庄，都是这样一个充满人情味的乡土社会，但在里面，乡土社会都无可挽回地逝去和瓦解了。在《遍地枭雄》中，上海郊区出生的韩燕来在进入上海这个“原子化”的社会时，感到无比的落寞，他渴望在开出租车的同行身上寻求情感联结，以至于在刚开始上路时竟然死死跟着前面一辆出租车跑，最后，他是在三个劫车的匪徒身上找到了家人般的感情。这四个无根无着的人，在居无定所、亡命天涯的过程中，始终形影相随，不离不弃。这里体现的其实是一种“江湖”，这是以一种“同性友爱”（homosociality）的原则组织起来的关系，与家庭、国家这些垂直的隶属性关系不同，它是一种平面的、在个体之间缔结的社会关系，因而是更加自由、更具开放性的，它多见于秘密会社、宗教团体、学术及政治团体之间^[47]。“江湖”其实是个陌生人的社会，而“homo-”实际上假设了一种同质性，可被预期的熟悉感，也即“四海之内皆兄弟”。有意思的是，几个劫匪们在路上唱的歌曲，如《难忘今宵》《假如你要认识我》《涛声依旧》等歌曲，唤起的是一种集体主义时代的想象，因此，这四个人的一路同甘共苦，有点像是一种对于业已失落的“集体主义友爱”的召唤和复归。由此，车实际上成为了一个“流动的共同体”。对于这种“流动的共同体”，王安忆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藏羚羊群：“它们生

活在非常美丽的地方，而且，它们自己也很美丽，没有人能够伤害它们，它们的生存也只需要一点点水和食物，所以，它们就很自由，每天只是跑来跑去，游荡来，游荡去。”^[48]而与这一“藏羚羊群”相似的另一个景象则是《匿名》末尾出现的成群结队骑着摩托车的惠安女子。这一景象我们并不陌生。每到春运时节，电视新闻上耳闻目睹的，便是同乡的民工开着摩托车，载着行李、妻小，浩浩荡荡返乡的画面。王安忆的“藏羚羊群”意象很可能正是从这里得到了启发。如果说“游荡来游荡去”是移民不可避免的命运，那么，即使居无定所，他们却始终成群结队，互相陪伴，这正是王安忆心目中对于全球化时代下一个理想“社群”的想象方式。

这种无根无系的孤独个体在漂泊中结成的“流动的共同体”，是对家的替代。王安忆在《匿名》里给出的说法是“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

“出门”这两个字，平时说说没什么要紧的，但在这里，与上半句里“在家”相对，就不是一般的出门了，更可能指的是一去不回，如何的飘零！茫茫人海，哪里是岸？这时候，朋友来了，这就要说到缘了，倘不是前世里修炼，哪里就遇得上。不是根子上发的权，为什么遇到的是他，不是他？这个缘，几抵得上血亲。所以，朋友可说是“出门”的生命树。两手空空来到外面，指望得上什么人？就是朋友。^[49]

类似的“出门”和“飘零”在近年来许多小说中都有体现。余华的《第七天》描写了一群飘零在外、客死他乡、无人安葬的孤魂野鬼。刘震云在《一句顶一万句》中呈现了一个由贩夫走卒、引车卖浆者组成的游民世界，在里面人与人的联结是脆弱的，它或被千山万水阻隔，或是被勾心斗角的算计所损毁。但王安忆却试图为这种“茫茫人海”的虚无提供救赎。王德威注意到，王安忆笔下的蚌埠、文工团、华舍镇，都是一种“中点站”般的存在^[50]。这些“中点站”提供了一个暂时栖息的场所，人们抱团取暖地共同度过一段时光，而后又各奔天涯。王安忆曾谈及蚌埠对于她的意义，即，当“文革”的动荡将生活的常规破坏殆尽时，她却在

蚌埠看到了熟悉的日常生活——“蚌埠究竟在以什么吸引着我们？那就是我们所熟悉的，习惯的，深感安全的日常生活，在这里找到了最近似的形貌。我们可在其间避身一时，暂忘烦恼。”^[51]“我们没想到，经历了所有这一切之后，事情还能够保持着延续。”^[52]同样，王安忆形容“文革”中的文工团是“‘圣经’里的方舟，是大动荡里的蔽身之地”^[53]。两者都是在世事的动荡中提供了“稳定”，在断裂中创造了“延续”，可以说，“流动的共同体”就是在“无常”中创造出“恒常”，在“虚无”中创造出“实在”，在“漂泊”中创造出“稳定”，在大都市中创造出“乡土”。

创造“流动的共同体”的方法就是以“乡土人情”去取代“陌生人社会”里的经济关系。王安忆的小说里充满了各式各样的“认亲”，“认亲”实际上是用已知去预设未知，用熟悉去“驯化”不熟悉。她说：“江湖就是个驯化世界。为什么说‘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父母是原始血缘，朋友则是驯化的关系。”^[54]比如刘教练带杨莹瑛去租房公司查询客户信息，本来是一种经济交往行为，但他与租房中介的打工妹互以“阿妹”“阿哥”相称，将其扭转为了“帮朋友找人”的人情关系。《乡关处处》中，月娥把自己照顾的上海老人当成爷爷一般看待，称爷爷的女儿为“大妹妹”，称爷爷的小儿子为“小弟弟”。当爷爷的女儿嫌月娥照顾不周时，两人将二百块钱攒来攒去，“不像是主雇，倒仿佛一对负气的姊妹，计较赡养父亲，谁付出多，谁付出少”^[55]。正因为月娥以一种乡土社会的温情与他人交往，她到哪里都可以随遇而安；处处无亲人，却又处处有亲人。《匿名》中，养老院的姑子早早失去了丈夫和孩子，但在她看来，“无论病孩子，瘫子，街上拾的老头儿，所长送来的无名无姓人，都跑不了是她的家人，从一条根上发的权，权上再发权，越发越远”^[56]。

这种“认亲”可以发生在任意两个个体之间。其缘由可能是偶然的，甚至起于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亲切感，比如《匿名》里的智障“二点”对“老新”的错认，比如失忆的“老新”与先天性心脏病患儿之间莫名的投缘，又比如敦睦与狱中高人的邂逅。但这种非理性的“灵感”或“情感”抵御的恰

恰是理性、经济的逻辑。野骨的退伍军人、九丈派出所所长、黑社会头子敦睦、九丈养老院、县福利院白化病孩子鹏飞、上海的志愿者，这些背景迥异的个体在现实的经济秩序中本没有交集，却出于对一个走失的上海老人和一个先天性心脏病患儿的情感关切而发生关联，形成了一个奇妙的网络。谢俊认为《匿名》中体现了“一个理想的乌托邦社群”，一个“匿名的细民世界”，“这里，民间的一个宏大事业是以一点一滴的方式展开的，何其艰辛，可是保留着因偶然或侥幸带来的喜悦，因为这个弧度的社会是充满可能的，而且在匿名的大众世界里，每个单体都充满活力，通过力量的集合和协商，他们最终让这个‘小天心’进入了国家救助体系，也有了‘名’”^[57]。而这些来自不同的阶层、职业、地域的“任意个体”之所以能够在同一时空相遇并产生联结，是全球化时代下高流动性经济的产物。经济全球化使原本被国族、阶层、种族等疆界所区隔的人们，跨疆域流动并杂居一处，桑德罗·梅萨德拉（Sandro Mezzadra）和布瑞特·尼尔森（Brett Neilson）以“劳动的多重分化”（multiplication of labor）和“边界的增殖”（proliferation of border）来形容这种劳动力的混杂和多样性^[58]。而王安忆小说中也常常出现这种“遭遇他者”的“异度空间”，华舍镇、柯桥、九丈老街、腰子弄、铜川路上的水产市场都是聚集着外乡人的地方，但共通的语言“普通话”和共通的情感却把来自不同地域的人们联结了起来。从“乡土人情”出发，王安忆似乎指向了某种天下大同的理想：天下大同就是“乡关处处”，无论在哪里，人与人之间始终可以凭借共通的语言、共通的情感——对贫弱之人的同情、对人的不幸处境的体谅和理解、对同伴的依靠和信赖——结成亲人一般的关系。“这街市就是放大的林窟，放到无限大！集市上的人，不论买卖的哪一方，都是他的乡人。”^[59]

显然，这样的流动共同体并不持久。作为一个传统经济单位的家庭尚且经受着分裂的压力，何况是无根无系、萍水相逢的陌生人？王安忆也知道她是以一种美学的、略带乌托邦色彩的叙述去弥补现实中移民生活的匮乏和破碎，所以这种“流动的共同体”具有一种瞬间性，提供的是一种美学补偿。

秧宝宝在磕磕绊绊中融入李老师一家，与蒋芽儿结下友情，但一年之后又要转学。月娥与爷爷共同居住，彼此适应了生活节奏和生活习惯，但很快又要因为爷爷的生病而另换工作和住处。因此，这种共同体是短暂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没有意义。事实上，短暂与长久是相对的。在王安忆新世纪以来的小说中，越来越强调一种存在主义式的体验，“质”超越“量”成为了更重要的品质。这种注重“当下”、注重“过程”而不问“结果”，对于移民来说是很现实的选择，物理空间的乡土已经留在了身后，未来在何处安身则无法预期，能把握住的就是“现在”，因此只能好好度过——“无论是过往还是未来的时间都湮灭在混沌中，只有正经历的现在才是具体可感”^[60]。王安忆也说过：“人生是目的为死亡的行程，所有的意义都在过程，完成人生的一日便是人生消亡的一日。”^[61]而这个过程可以用“渡海观音”的“渡”来理解——“‘现在’的意义究竟是什么？‘现在’的意义就是‘度过’。有没有进过庙堂，看见过‘渡海观音’？就是那个‘渡’字”^[62]。茫茫人世，何以为渡？就是与陌生人结成的流动的共同体。王安忆对“过程”的强调实际上是主张以更为通达的态度面对移民的漂泊人生，人生的意义正存在于每一个与陌生人共同度过的“当下”，人们能做的就是珍惜每一次的邂逅，善待每一个遇到的“朋友”，珍惜与陌生人形成的情感联结。

结 语

王安忆新世纪以来的小说，如《上种红菱下种藕》《众声喧哗》《骄傲的皮匠》《新加坡人》《富萍》《遍地枭雄》《匿名》《红豆生南国》等作品中，主人公都过着一种没有家庭的漂泊生活，但他们却在陌生人身上找到了“家”的归属感。一方面，这是对全球化时代下家庭难以为继的政治经济现实的反映，即，人们为生活所迫，在高流动性的经济中四散离徙，只能与陌生人打交道和共同生活。另一方面，她试图以一种“日常生活”和“情感劳动”的逻辑重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陌生人的家人化”体现在两类题材中，一种是“保姆的故事”，

以《上种红菱下种藕》《富萍》《乡关处处》《向西，向西，向南》为代表，在这些作品里，她强调了“在场”和“过程”的重要性，亲身参与、亲身劳作、与他人共同度过的生活，成为了缔结情感联系的媒介。另一种是“江湖的故事”，以《遍地枭雄》和《匿名》为代表，在里面，个体彻底脱离了家庭，浪迹天涯、四海为家，但他们却以“认亲”的方式，将“家人”的想象投射在陌生人身上，并为之操劳，从而再造一个“乡土人情社会”。这种在“偶遇”中建立的“流动的共同体”虽然是短暂的，却是一种超越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社会关系，它体现了乡土社会中的互惠互利、互相扶助、暖老温贫的人际关系，甚至是对已经逝去的集体主义的某种挽回和再造。就此而言，王安忆所设想的由迥异的个体组成的“流动的共同体”可以说是对后福特主义时代“陌生人社会”的一个尝试性的回应和解决方案。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新时期初现实主义的基本美学问题研究”（批准号18YJC751052）的阶段研究成果]

[1][15] 王晓明：《从“淮海路”到“梅家桥”——从王安忆小说创作的转变谈起》，《文学评论》2002年第3期。

[2] 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2017》，第16页，中国统计出版社2017年版。

[3] 陈锡文，赵阳、罗丹：《中国农村改革30年回顾与展望》，第197页，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4] 王安忆强调小说的虚构必须建立在现实合理性上，而生计问题是其中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参见《小说的当下处境》《小说的创作》，张新颖、金理编：《王安忆研究资料》，第175页，第198页，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5][6][17] 王安忆：《香港的情与爱》，《香港的情与爱（王安忆自选集·第三卷）》，第520页，第575页，第510页，作家出版社1996年版。

[7] 王安忆：《红豆生南国》，《红豆生南国》，第7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版。

[8] Claude Meillassoux, *Meals, Maiden and Money: Capitalism and the Domestic Econom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101.

[9] 温铁军：《三农问题与世纪反思》，第112—113页，三

联书店 2005 年版。

[10][11] 贺雪峰:《地权的逻辑》,第 229 页,第 36 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

[12][13][33][40][55] 王安忆:《乡关处处》,《红豆生南国》,第 49 页,第 32 页,第 15 页,第 12 页,第 23 页。

[14] Xudong Zhang, “Shanghai Nostalgia: Postrevolutionary Allegories in Wang Anyi’s Literary Production in the 1990s”, *Positions: East Asia Cultures Critique*, Vol. 8, No. 2 (2000), pp.349–387. Ban Wang, “Love at Last Sight: Nostalgia, Commodity, and Temporality in Wang Anyi’s Song of Unending Sorrow”, *Positions: East Asia Cultures Critique*, Vol.10, No.3 (2002), pp.669–694.

[16] 王安忆:《情感的生命——我看散文》,张新颖、金理编:《王安忆研究资料》,第 158 页。

[18] 王安忆:《接近世纪初》,《书屋》1998 年第 1 期。

[19] 王安忆:《上种红菱下种藕》,第 124—125 页,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4 年版。

[20] 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汉娜·阿伦特主编:《启迪:本雅明文选》,张旭东、王斑译,第 234 页,三联书店 2008 年版。

[21] 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张旭东、魏文生译,第 66 页,三联书店 2007 年版。

[22][23] 王安忆:《小说的情感》,《王安忆研究资料》,第 129 页,第 130 页。

[24][27] Michael Hardt, Antonio Negri, *Multitude: War and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Empire*, New York: Penguin Group Inc.2004, p. 108, p. 109.

[25] Michael Hardt, Antonio Negri, *Empire*,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253.

[26] Mariarosa Dalla Costa and Selma James, *The Power of Women and the Subversion of the Community*, London: Falling Wall Press, 1975, p. 33.

[28][29] Arlie Russell Hochschild, *The Managed Heart: Commercialization of Human Feeling*,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2, p.11, pp.33–34.

[30][58] Sandro Mezzadra, Brett Neilson, *Border as Method: or the Multiplication of Labor*,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105–106, p.7.

[31] 范雨素:《我是范雨素》,《时代报告》2017 年第 19 期。

[32] 王安忆:《富萍》,第 12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9 年版。

[34] 参见 Ann Laura Stoler: *Carnal Knowledge and Imperial Power: Race and the Intimate in Colonial Rule*, Berkeley,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2, pp.48–51.

[35][39] 王安忆:《新加坡人》,《王安忆小说选》,第 457—458 页,第 442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9 年版。

[36] 王安忆:《用你的矛攻你的盾》,《情感的生命》,第 154 页,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8 年版。

[37][38][49][54][56][59][60] 王安忆:《匿名》,第 91 页,第 50 页,第 261 页,第 330 页,第 249 页,第 156 页,第 79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6 年版。

[41][42] 费孝通:《乡土中国》,第 14 页,第 119 页,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 年版。

[43] 王安忆:《生活的形式》,《当代作家评论》2005 年第 1 期。

[44][45][46][53] 王安忆:《文工团》,《文工团》,第 172 页,第 190 页,第 216 页,第 203 页,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3 年版。

[47] Haiyan Lee, *Revolution of the Heart: A Genealogy of Love in China, 1900-1950*,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29–30.

[48][62] 王安忆:《遍地枭雄》,第 237 页,第 239 页,文汇出版社 2005 年版。

[50] 王德威:《前青春期的文明小史》,《王安忆研究资料》,第 712 页。

[51][52] 王安忆:《蚌埠》,《中国好小说:王安忆》,第 89 页,第 87 页,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3 年版。

[57] 谢俊:《匿名的大众:谈谈王安忆新作〈匿名〉中的“真实”与世界》,陈思和、王德威主编:《文学》2016 年“秋冬卷”。

[61] 王安忆:《艺术是一个过程》,《情感的生命》,第 201 页。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外文系世界文学与文化研究院]
责任编辑:费冬梅